

# 西藏历史的割篇章

牙含章

## **西藏历史的新篇章**

---

**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**

**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**

---

**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5.5 插页7字数73千**

**1979年7月第一版 1979年7月第一次印刷**

**印数：1—4,300册**

---

**书号：M11140·5 定价：0.50 元**

---

## 目 录

西藏历史的新篇章（代序）	（ 1 ）
西藏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	（ 27 ）
文成公主与汉藏友谊	（ 67 ）
达赖喇嘛的封号、地位、职权和噶厦的由来	（ 78 ）
西藏地方政府的反动本质	（ 89 ）
西藏人民的新生	（ 117 ）
西藏喇嘛教浅说	（ 137 ）

## 西藏历史的新篇章（代序）

最近十几年来，世界上出现了一门新的“热门”学科，叫“西藏学”。国际上通用的名称是 Tibetology。这门学科已发表了许多论文，出版了不少专著。据初步了解，“西藏学”研究的内容非常广泛，包括西藏的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风俗习惯，等等。一九七六年九月，在匈牙利曾召开了一次以纪念乔马·克勒什为名的讨论会，会议由匈牙利科学院院士利益蒂主持。参加会议的人来自十四个国家：匈牙利、东德、蒙古、波兰、苏联、捷克、奥地利、英国、丹麦、意大利、美国、法国、西德和日本。这是第一次国际性的研

究西藏和中亚的东方学家的集会。会上发表了关于“西藏学”的报告和学术论文共四十篇。

一九七七年六月，瑞士的苏黎世大学又召开了一次青年“西藏学”家的讨论会，名为“年轻藏学家的习明纳尔”。有瑞士、西德、奥地利、意大利、英国、瑞典、挪威、美国、丹麦等十几个国家的代表参加，发表了有关“西藏学”的报告与论文多篇。现在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民族学博物馆，已成为一个“西藏学研究中心”。一九七七年四月，在日内瓦的贝勒林山上，由瑞士尼姑阿尼·安赛美特发起，成立了一个“高级西藏研究中心”。类似的所谓“西藏学”研究中心在世界其他国家还相继成立了不少。

这门“西藏学”最近十几年来在世界各国突然成为一个“热门”学科，这和一九五九年西藏一小撮反动农奴主发动武装叛乱，因而引起了全世界对我国西藏问题的注意，有直接关系。

西藏的武装叛乱，是一九五九年发生的。

这次叛乱，是由一小撮反动农奴主煽动的。参加叛乱的人，有的是受了蒙蔽的，绝大多数则是被裹胁和挟持的。死心踏地的保护反动的农奴制度，反抗民主改革的，毕竟是极少数人。

西藏武装叛乱被平息后，有许多西藏人被裹胁流亡到了国外，他们带出去了大批的有关西藏历史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、艺术等等方面珍贵文物和史料（包括许多手抄本和手写的贝叶经）。其中许多都是从来没有发表过的秘件，不仅外国人没有见过，就是西藏人民过去也是很少接触。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史料到了国外以后，大部分以高价卖给了外国人，随后辗转散落到各国“西藏学”家的手中。剩余的一部分有人把它集中起来，在印度达尔玛萨拉地方成立了一所“西藏著作及档案图书馆”，专供外界借阅使用，因而吸引了不少“西藏学”家的兴趣，纷纷汇集该馆借阅。这个图书馆除出版一种季刊，叫作《西藏杂志》外（现已出版多期），还编辑出版一种

《西藏宗教历史丛书》，发表了不少专著。

流亡国外的西藏人还在印度达尔玛萨拉建立了一所“西藏因明学院”，师生有五千多人。他们还在印度瓦拉纳西地方建立了另一所“西藏高级研究所”，据说是专门研究“密宗”（经典）的。

从西藏宗教教派来说，上面讲的这些机构，主要是格鲁派（黄教）搞的。萨迦派（花教）在印度也出版一种月刊，叫《西藏评论》，现已出至第十三卷，它约请世界各国的“西藏学”家为它撰稿，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影响。

流亡国外的西藏人里面，只有极少数是反动的僧俗大农奴主，他们至今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，妄图有朝一日在西藏恢复野蛮、黑暗、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，使西藏劳动人民吃二遍苦，受二茬罪。但是那些原来受蒙蔽、被裹胁的藏族同胞，在国外过了二十年的流亡生活，饱尝了离乡背井，沦落异邦的痛苦滋味。有些人早就毅然作出了重返西藏的决定，表示愿意

改恶从善，回到祖国的怀抱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从而取得了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西藏人民的谅解，在政治上给了他们出路，生活上得到适当的安排。这样返回西藏的人，过去已有不少。

最近，流亡国外的藏族同胞派遣代表，要求返回西藏自治区参观访问。西藏自治区已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七日在拉萨成立了“接待藏族同胞归国和参观委员会”。在有五百余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上，发言的人一致表示，希望在国外的藏族同胞，包括达赖喇嘛在内，回到祖国怀抱，与各族兄弟一起，同心协力，建设可爱的家乡新西藏，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。

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六日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举行春节联欢会。人大常委副委员长阿沛·阿旺晋美在这个会上也谈了他的感想，他说：

“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庆祝春节，我感到

遗憾的是达赖喇嘛和在国外的藏胞离开祖国二十年，现在仍在国外，不能和我们一起欢庆佳节。我相信，他们也是想念祖国，愿意回到祖国的怀抱中来。但是，还需要有一个过程，这就是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，理解西藏历史发展的趋势，了解西藏大多数人民是热爱党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。西藏人民是坚决反对分裂，反对倒退的。我愿意奉劝他们，党的政策是明确的，是完全可以信赖的。我希望他们认清形势，争取早日回来，同我们一起建设祖国，建设自己的家乡，这才真正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。”（注一）

阿沛·阿旺晋美在谈话中，希望流亡国外的藏族同胞，包括达赖喇嘛在内，进一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，了解西藏历史的发展趋势，了解西藏广大人民的人心所向。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我们不能不指出，最近十几年来，在国外出版的不少论述西藏历史，论述党在西藏的政策的论文和专著中，散布了许多歪曲

西藏历史，污蔑党的政策的谬论，胡说什么“西藏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”，“中国灭亡了西藏”，“西藏民族现在处于被征服被奴役的悲惨境地”，如此等等。这些谬论在流亡国外的藏族同胞中所产生的不良影响，是决不可以低估的。要肃清这些谬论的流毒，不仅需要一个过程，更重要的是需要我们做大量的工作。只能用正确的思想，才能战胜错误的思想。思想斗争是不能用其它的斗争代替的。

马克思主义者是历史唯物主义者。我们尊重历史，不允许歪曲、篡改历史。我们主张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。

西藏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这是西藏人民长期以来与我国各族人民、特别是与汉族人民结成亲密的兄弟关系，经过长期的友好往来、团结互助、患难与共的历史发展所得到的必然结果。要从理论上说明它的必然性，这就必需上溯到西藏的古代历史，要对西藏的古代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。而且，孤立地谈西

藏的古代史是不能说明问题的，必须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的关系，特别是汉藏两大民族的关系。

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，我国历史是一部多民族的历史。伟大的祖国是我国各民族共同缔造的。但在中国历史上，由于各民族内部是剥削阶级当家作主，因此就不可避免地时常发生民族之间的斗争。从而，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时是分立的，有时是联合的。这种分分合合的历史持续了若干世纪。但从总的历史发展趋势来说，则是越到后来，各民族都趋向于联合起来，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。因为这符合各民族发展的共同利益。

藏族与中国各民族，特别是与汉族联合起来，建立统一的国家，是经历了若干世纪的酝酿过程的。从汉藏两大民族的文字记载来看，中国历史上的唐朝时期，也就是藏族历史上的吐蕃（注二）时期，是汉藏两大民族建立友好关

系的发展时期，也是汉藏两大民族在政治上联合的发展时期。

西藏历史上的繁荣时期是吐蕃时期。在这一时期，藏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获得了巨大发展。而这个巨大发展是和汉族人民的帮助分不开的。大家都知道，唐朝有两个公主嫁给吐蕃的赞普（王），一个是文成公主，一个是金城公主。据一些汉藏文史料记载，文成公主嫁到吐蕃的时候，从祖国内地带去了大批的工匠（包括冶金、制铁、纺织、印染、酿酒、造纸、制陶，等等），带去了大量比较先进的农具，带去了内地的各种粮食种子和蔬菜种子，带去了大量的丝绸等纺织品，带去了汉族的成套的乐谱和各种乐器。还带去了各种汉文书籍（从经书到诗歌等文学作品）。松赞干布为了学习汉族的文化，还专门从藏族贵族子弟中挑选了一批人，送到唐都长安（西安）学习。这是汉藏文化的一次大交流。毫无疑问，汉族人民也向藏族人民学习了许多好的东西。但是当时已

进入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的汉民族，其生产技术、学术思想、生活方式等方面，要比尚处在奴隶社会的藏族进步。而先进的东西总是要战胜落后的东西，这是一条普遍的规律。因而唐朝与吐蕃的这次文化大交流的结果，就必然对藏族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，藏族人民对于这一点是没有忘记的。他们用什么形式来表现对汉族人民的这种友谊的感激心情呢？在那个时代，不可能有现在这样的认识。当时，藏族人民把这种珍贵的友谊寄托在对文成公主的怀念上，于是文成公主成了藏族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位伟大的女性。至今，在布达拉宫和大召寺内还塑有文成公主的塑像，古老的藏戏中有《文成公主》这一传统节目，文学作品中有文成公主嫁到吐蕃的长篇小说，此外，还有诗歌、口头文学等。总之，直到现在，一提到文成公主的名字，藏族广大人民没有一个不表示敬佩和怀念的。当然，文成公主作为唐太宗的一个宗室女，千里跋

涉，嫁到西藏，对上面所讲的那次经济、文化大交流是有一定促进作用的，而其主要功绩，则应属于当时的广大汉族人民，特别是跟随文成公主到吐蕃的汉族劳动人民，他们为汉藏两大民族的友好合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汉藏两大民族在经济、文化上的长期共同发展，共同繁荣的亲密合作，必然要在政治上形成友好往来、团结互助的兄弟关系。这是有历史记载为证的。唐高宗曾封吐蕃赞普(王)松赞干布为“驸马都尉”、“西海郡王”，后来又晋封为“赛王”，这充分证明汉藏民族这段历史时期的政治关系。所以，当唐朝末年吐蕃发生内乱，宗教徒刺死了吐蕃赞普朗达马时，有人要立一个新赞普，吐蕃大将论恐热起来反对，他说：“无大唐册封，何名赞普？”可见当时新赞普即位，必须经过唐朝皇帝册封的手续，这已成了当时公认的不成文的法律。

自从十世纪西藏地区发生奴隶大暴动以后，吐蕃王室崩溃了，西藏分裂成为许多小的地

方割据势力，互相之间不断发生内战，以致生产破坏，田园荒芜，民不聊生。这种分裂状态大约持续了四百年之久。这四百年是西藏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，也是西藏的社会生产发展陷于停滞的时期。西藏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谁还有心思去发展生产？究竟为什么西藏在这四百年之中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政权？这个问题应作深入的研究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正是西藏处于分裂状态的这四百年中，整个中国基本上也处于战争分裂状态。唐朝帝国崩溃以后，接着是五代十国时代，经历将近半个多世纪。五代以后是北宋和辽同时对峙，又持续了约有一个半世纪。后来又是南宋与金、西夏同时对峙，又经过了一个多世纪。由于以上种种原因，国内各族人民与西藏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中断了，西藏民族得不到祖国兄弟民族的有力帮助，这恐怕和西藏地区分裂四百年之久的历史不无关系。

后来，中国是怎样重新统一起来的呢？这

是我国蒙古族对缔造祖国统一事业的伟大贡献。大约在十三世纪中期，元宪宗蒙哥派了一支部队进驻西藏，设立了一个“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”。都元帅府之下，又设立了十三个万户长，以统治前后藏和阿里地区。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，元朝政府又把西藏萨迦派法王八思巴封为“国师”、“大宝法王”，并把西藏整个地区“赏赐”给他管理，这就是西藏历史上的“萨迦王朝”。也是西藏地区建立“政教合一”制度的开始。

元宪宗蒙哥派兵进驻西藏，结束了西藏持续了四百年的分裂状态，结束了西藏民族内部连绵不断的内战，实现了安定的局面，给西藏人民创造了“休养生息”的环境，满足了西藏人民长期盼望的和平愿望。这就使西藏人民从亲身体验中得到了和祖国各兄弟民族联合在一起，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好处。这是符合西藏民族与祖国各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历史趋势的。是谁也改变不了的。所以当元朝统治崩

溃，由元朝扶植起来的“萨迦王朝”也随之垮台，但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并未因此而发生重大变化，仍然继续保持着由元朝建立并巩固下来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。这不是偶然的。因为西藏广大人民从与祖国各兄弟民族联合，建立统一的国家中，得到了安定与和平，他们不愿再回到以前那种分裂、混乱状态中去。

继“萨迦王朝”而建立起来的是“噶举王朝”（也叫“帕主王朝”）。这个“噶举王朝”的创始人叫帕莫主巴，他本人就是接受元朝政府封号的一个万户长。元朝崩溃以后，噶举法王向明朝皇帝进贡，并请求封号。明朝皇帝封他为“阐化王”。以后历代的噶举法王都继承这一封号。明朝政府在河州（今甘肃临夏县）设立了“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”（注三）以统一管理西藏地方的事务。

和元朝一样，明朝历代皇帝经常派官员到西藏去，给各寺庙“熬茶”，“放布施”，还聘请西藏各教派有名望的喇嘛到北京讲经，并